

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

愉悦卷

两宋辽金西夏元明清

向以鲜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國石刻藝術編年史

金中題



愉悦卷

两宋辽金西夏元明清

向以鲜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引论

中国石刻艺术发展的历史,到了两宋(含辽金西夏)时代,也由黑格尔所说的艺术的理想时代进入了愉悦的时代。在本书最开始的叙述中,曾这样谈及这种转变:由理想而至愉悦,几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黑格尔的判断是:理想的风格如果从秀美朝外在现象方面再前进一步,它就会转变为愉快的或取悦于人的风格。愉悦时代的作品,其细节是作为装饰,穿插和陪衬而放进作品中去的,实际上是在投合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愉悦的艺术由于更多的是考虑欣赏者或接受者的趣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会失去艺术家本人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呈现一种媚世甚至媚俗的倾向。黑格尔举例说:比如那些单独的小型造像,珍宝、腮帮上的小酒窝,珍贵的首饰,微笑,服装的形形色色的褶纹,动人的颜色和形状,奇特的难能可贵的然而并不显得勉强的姿势,如此等等,这些组成部分单凭它们本身就使人愉快。这个时候,对于细节的过分强调已近于繁琐,虽然堪称巧夺天工,但却少了鲜活的气韵,少了来自造化深处的神秘与感动。中国明清时期的石刻艺术,已基本脱离了汉唐时代的博大与壮丽,转而走向精致与繁缛,在装饰化、工艺化、人文化的强力驱使之下,将愉悦的石刻艺术推向新的趣味。

这种转变具体表现在两宋时代的雕塑尤其是石刻艺术中:石刻的神秘性与壮丽感渐渐消失,而取悦于人的亲切、平易甚至略显平庸的艺术诉求越来越明显。中国文化中那种雄强博大的气势,也被一种精致和唯美所取代。在10世纪以后的三个世纪中,正如王子云指出的那样,由于外族的不断入侵,民族

的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受到一定程度的挫伤。这些反映在雕塑艺术上,则表现为此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品其形象较为委顿,缺乏像两汉或初盛唐时期那样的雄大气魄,缺乏一种内在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此时期作品的生活意识不断加强、写实程度不断提高,在工艺技术上则得到长足进步。如果联想两宋以至辽金的诗、文、词中所处处透出的那种平易、自然、亲切、妩媚,则可看出这是与社会的发展,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时代风尚以及由此形成的审美思想、趣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由唐代的石刻而至宋代的石刻,其间最显著的变化在于,石刻艺术的由圣而俗(凡)。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分析说,禅宗在理论上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起来:不要那一切烦琐宗教教义和仪式;不必出家,也可成佛;不必那样自我牺牲、苦修苦练,也可成佛。并且,成佛也就是不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也就是成佛。从“顿悟成佛”到“呵佛骂祖”,从“人皆有佛性”到“山还是山,水还是水”,重要的不只是“从凡人圣”,而更是“从圣人凡”。李泽厚认为,宋代雕塑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无论是大足石刻、晋祠宋塑以及麦积山的著名宋塑,都创造了迥然有异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它不是思辨的神(魏)或主宰的神(唐),而完全是世俗的神,即人的形象。它比唐代更为写实,更为逼真,更为具体,更为可亲甚至可昵。大足北山那些观音、文殊、普贤等神像,面容柔嫩,眼角微斜,秀丽妩媚,文弱动人。麦积山、敦煌等处的宋塑也都如此,更不用说晋祠的那些有名的侍女像了。大足、麦

积山那些最为成功的作品——优美俊俏的形象正是真实的人间妇女，它们实际已不属于宗教艺术的范围，也没有多少宗教的作用和意味了。很显然，仅就宗教石刻而言，北魏、唐代和两宋，的确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审美范式，它们正好对应了黑格尔所说的严峻、理想和愉悦。

宋代石刻，仍然以陵墓石刻和宗教摩崖石窟造像为主。宋代的陵墓石刻，以河南巩县北宋七帝八陵为代表。如果我们将北宋帝陵石刻与关中唐陵石刻相比较，则会十分明确地感受彼此之间无论是气魄或内在力量之上，都是迥然不同的。北宋七帝八陵的石雕，从时代较早的太祖永昌陵到第七代哲宗永泰陵，时代跨度一百多年，因此其间的风格变化也是相当漫长的。总的来看，前期作品显得要劲健朴茂一些，越到后来，就越让人感到绵柔和苍白。宋陵石刻中，最杰出的作品多出现于动物石刻方面，尤以狮子、大象和羊给人印象最为深刻。河南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东陵的狮子，西陵的象，滹沱陵的好石羊。这儿的东陵指神宗永裕陵，西陵指哲宗永泰陵，滹沱陵指太宗的永熙陵。宋陵陵垣南门外，均雕有守门的一对立狮。王子云将宋陵石狮与唐陵石狮进行了有趣的比较，这些狮子是在走动而不是静止站立的：这类走狮，在唐帝陵前的石雕中，仅有太宗昭陵和武后母顺陵前有此形式，其余各陵全为后肢蹲坐、前肢直立的所谓蹲狮。而北宋各陵全都雕有走狮一对，并且脖项上带有项环和串铃，还拴有一条长长的锁链绕置狮背，说明这是宫廷驯狮而不是野狮。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唐狮的优越在于气势轩昂，显现出作为兽中之王的威猛气概，这是由周身强有力的肌肉和昂扬不可一世的雄姿来体现的；而宋代永熙陵走狮在气魄上，尤其内在的精神状态上，显然较唐顺陵石狮有很大的差距，但在作为猛兽狮子的主题的表现上，仍然有其艺术上的成功所在。

除宋陵之外，西夏王陵也出土过一些石刻，以力士柱础及汉、夏文合刻的石碑等最具特色。西夏王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西部的贺兰山东麓。在

方圆 50 多平方公里的陵区内，共有九座帝陵、250 多座陪葬墓。辽金陵墓石刻，也有相当一部分遗存了下来，而以北京地区保存得最多。辽南京和金中都均在此地，辽金两代相踵，前后达 240 多年。在《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一书中，即辑录有 300 多种辽金石刻，其中包括碑刻、经幢、墓幢、墓志、石函、石椁、造像等。辽金石刻在选材方面十分讲究，大多采用白色大理石，只有极少数使用青石或花岗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螭首龟趺的石碑和高大颀长的经幢，虽然完全汉化，但雕饰古朴，别有一番韵味。辽代的石狮也很有特色，1959 年曾在内蒙古宁城大明城出土一件石刻辽狮（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虽然只有 20 余厘米长，但其石狮造型威猛，龇牙怒目，形象凶狠，鬃须呈放射状，腰部和后腿富有内在弹性，夸张而有节奏，动感十足，颇有唐狮遗风。其刀法之奔放洗练，代表着辽代民间雕刻技艺已达到极高水准。

两宋石刻的另一大重点当然是宗教摩崖石窟造像了。总的来说，中国石窟造像艺术进入两宋时代，已开始走向没落。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两宋的摩崖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最后的辉煌（以重庆大足石刻为代表），虽然之后的元代亦偶有出色之笔，但那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式的亮色而已。在一些传统的大型石窟如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处，已较难见到宋代所开凿的石刻雕塑作品。王子云分析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时说，进入 10 世纪以后的宋代，不仅是对于佛教信仰的衰退，更主要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的没落。因为北宋从一开始就受到辽、金、西夏的不断侵扰，使社会得不到安定的局面，对于工程较大的石窟的开凿，自然受到影响，因而出现了那种因陋就简、便宜取巧的没落现象。我们认为王子云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至少是不全面的。两宋时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帝国虽然没有达到唐代那样庞大辽阔的版图，但其社会却获得了相对的安宁，并且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均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因此陈寅恪才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

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我们认为摩崖石窟造像至两宋而渐趋衰落,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的不稳定或国力的空虚,其背后的真正动因,可能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自南北朝始,南方重义理而多寺院,北方重实修而多石窟),以及宗教的世俗化等相关。正如阎文儒所说,宋代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民间艺人的增多,文学上出现了比较接近大众化的文言,描写民生疾苦、爱情、神怪等,刻画得更为逼真。因而反映到石窟艺术上,在刻画生活方面、人像方面,都能比较细致,不像南北朝、隋唐那样雄劲而壮丽。而宗教艺术,一旦过分世俗化,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根本所在,因而摩崖石窟造像的没落,是一种不可逆的历史趋势。

宋代石窟,较著名者,除重庆大足、浙江杭州之外,陕北的宋窟亦颇值得关注。陕北在北宋中期,由于北宋和西夏达成相对的和平局面,因而该一地区获得了与富庶的西夏交往的机会。加之西夏亦十分崇信佛教,陕西的石窟工匠又远近闻名,因此形成宋代西北石窟重镇,当在情理之中。在陕北的北宋石窟群中,最为出彩的是大量出现的罗汉石刻。宋代罗汉像多以16、18甚至500为组群,这些罗汉造像充满生活气息,其人物面貌、性格、姿态、形神千差万别,颇有几分石刻浮世绘的感觉。陕西黄陵、子长两地石佛寺,其雕像中的罗汉像,生动传神,跃然于石上。而属于辽、金两代的佛教石窟,主要有辽宁巴林左旗附近的辽代石窟群;陕北富县石窟中,有一部分可能属于金代石窟;在莫高窟和安西万佛峡石窟雕塑中,也有西夏开凿的少量石窟。

阎文儒分析重庆大足宝顶造像时说,宝顶造像中最重要的是父母恩重经变、地狱变与十王图。父母恩重经变把故事雕造成一幅连环图:从“投佛祈求嗣息”起,中经“怀胎守护”、“临产受苦”、“生子忘忧”,以至“究竟怜悯”等共11幅图,每幅图均以真实形象表达故事内容。如“生子忘忧”中青年父母对小儿欢欣的神态;“洗濯不净”中母亲作洗濯之状,小姑娘抱儿向母头上作把尿形状,这些日常的真实动人的手法,给人印象深刻。在地狱变中,以截膝地狱劝人

戒酒,石刻画面中表现由于饮酒昏乱,以致父不识子,兄不认弟,夫不认妻,姊不认妹等颠倒行为。这些来自生活中的真实画面,在以前的石窟造像中从未出现。这些清新质朴的石刻之风,为没落时代的石窟造像,注入一股强劲的生命活力。

宋代出现了中国建筑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即由李诫撰写的《营造法式》。当然我们今天能读懂这部伟大的建筑学著作,得感谢梁思成先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梁思成第一次见到《营造法式》,那时他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梁思成后来回忆说: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后来,梁思成几乎用毕生心血诠释了这部了不起的建筑“天书”。李诫之所以能撰就此书,与宋代高度发达的建筑艺术紧密相关。而中国的建筑是典型的木石(包括砖)建筑,因此,建筑石刻至宋代得到空前繁荣。在李诫的书中,就有不少地方论及建筑石刻者,包括脊兽、柱础、门狮、廊柱、牌坊、桥梁等。宋及其以后的历史中,在寺庙建筑方面也有较大发展。由于淫祠、淫祀的兴起,寺庙的性质及类别得到了巨大的扩展。民间多神信仰而导致的诸如药王、城隍、土地神、财神、灶神、雷神等众神庙,其中亦不乏石刻偶像,成为愉悦时代石刻艺术的又一景观。

契丹人信佛,并在佛教造像方面深受唐人影响。辽人造像和中晚唐造像十分相似,此一现象颇值得关注。但是唐辽之间,其精神与气韵还是不同的。金申指出唐辽宋石刻造像之别:辽代造像两肩宽厚,身躯饱满,上半身偏长,给人以凛凛堂堂、伟岸端庄之感,残留着唐造像浓厚遗风,对比辽宁义县奉国寺胁侍菩萨、河北蓟县独乐寺胁侍菩萨、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造像以及山西应县木塔造像,可以看出这些风格的一致性;反之,与南方宋朝地域的佛像相较则后者造像显得繁缛细腻,阳刚不足。例如作于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宋初杭州烟霞洞洞口观音、势至像,雕镂繁缛,气质柔弱,不及辽造像质朴健美有力,而烟霞洞开凿时恰当辽统和年间(984—1012

年),相比之下可见宋、辽造像风格之明显差异。但是宋朝造像较之辽朝更具流畅和自然生动,衣纹处理手法样式很多,如江苏吴县角直镇保圣寺所谓杨惠之作品实为北宋所作罗汉坐像,裙角衣纹向足部密集,繁复生动,而膝关节仅一道折痕;又如山东长清灵岩寺千佛殿罗汉坐像(北宋嘉祐年间)衣纹深厚流畅,在膝部也见不到辽佛的衣纹形式。辽承唐风,那么唐辽之别又表现为:唐代凡跌坐的佛像裙部衣

纹多呈从两足部分向两侧放射状平行舒展,纹线很长,直达膝部,衣纹大致与腿部平行,膝关节曲折处少有衣纹。辽佛则不然:在膝关节部分都有三四条衣纹,呈纵列平行的短线,这种衣纹很难在唐佛和宋佛上见到。此种膝部纵向的短衣纹在大同华严寺主尊佛像和胁侍菩萨坐像上都可见到。

就总的风尚来看,宋代的石刻艺术,是愉悦的,亲近的,接地气的,并且始终充满人性关切的艺术。

公元 960 年 建隆元年

[提示] 开凿四川安岳华严洞。

[叙录] 《宋史》(太祖本纪)载:建隆元年正月,在陈桥兵变中,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局面,夺取后周政权,赵宋王朝正式登台亮相。迄今,在河南开封东北的陈桥镇(封丘县)东岳庙中,还遗存有著名的《宋太祖黄袍加身处碑》。在东岳庙大殿之前,还有一棵古槐树,相传是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时拴马之处,后世称为“系马槐”。此槐树干周长达五米多,树前还刻立有一块石板,上面有清书法家吴门张松孙所书写的“系马槐”三个大字。这儿显然是值得赵宋纪念的地方,它是赵宋发迹圣地。

宋朝的石刻艺术华章,从有明确纪年的造像来看,是从四川地区翻开第一页的:建隆元年,开凿四川安岳华严洞。据刘长久载,华严洞位于四川安岳石羊镇箱盖山上,距石羊镇 6 公里,安岳县城东 50 公里,而离重庆大足则只有 30 余公里。华严洞石窟高 6.2 米、宽 10 米、深 11.3 米。袁恩培、张磊撰文说,华严洞石窟造像,以密宗为主,为释、道、儒同窟造像,题材十分丰富。窟中造像分布于左中右石窟壁,中间是高 520 厘米的华严三圣雕像:毗卢遮那佛居中,左普贤右文殊,左右壁并排着高 410 厘米的十大菩萨坐像。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石窟两壁的十大菩萨造像,古代匠师们着力对其面部进行了细腻刻画,充分表现出了众菩萨形象的美丽和内心的慈悲。线面结合的镌刻手法,加之具东方特色的镂空饰花宝冠、珠串璎珞以及行云流水似的帔帛、衣褶,衬托出菩萨气质的高雅,身份的华贵。洞窟两壁上方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求法图》独具特色,他方少见。华严洞石窟洞口两边所刻下的山狮、准提佛母、摩利支天,面相凶恶,与慈悲的佛、菩萨及多变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独特的对比造像手法,使得窟中的造像变得鲜活生动,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

[文献] 元脱脱《宋史》,刘长久《安岳石窟艺术》,袁恩培等《论安岳华严洞石窟造像艺术的美学特征及价值》(《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0 年第 2 期)。

公元 961 年 建隆二年

[提示] 苏州建成云岩寺塔。

[叙录] 是年,苏州建成云岩寺塔。苏州云岩寺塔即虎丘山塔,创建于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于是年竣工。春秋时吴王夫差曾葬其父阖闾于此,有白虎雄踞其上,故名虎丘。据常青、罗哲文等记载,虎丘塔七级八面,砖身木檐,内外两层枋柱半拱。塔建成之后遭到多次火难,现存塔身高 47.5 米。20 世纪 50 年代,曾在塔内发现众多文物,其中莲花石龟甚为罕见。1954 年,南京工学院著名建筑学者刘敦桢曾对虎丘塔进行过实地考察,并撰写了著名的《苏州云岩寺塔》论文,首次科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虎丘塔的历史和现状,为后来的维修与研究工作的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献] 常青《中国古塔的艺术历程》,罗哲文《中国古塔》,刘敦桢《苏州云岩寺塔》(《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7 期)。

公元 962 年 建隆三年

[提示] 五月二十九日,山西刻《荀息庙碑》。是年,刻《太祖誓碑》。

[叙录] 五月二十九日,山西刻《荀息庙碑》。据清人胡聘之载,此碑高四尺二寸五分、广一尺九寸五分,十八行、行四十七字,正书,今在乡宁县。原刻署“三州都料亢延镌字”,程章灿认为此刻工姓名或有讹,或应作“亢延”。荀息事迹见《左传》相关记载,本姓原氏,名黯字息,为春秋时晋国大夫。晋武公灭荀国后,以荀国旧地赐原氏黯,原氏黯以荀为氏,故史称荀息。晋献公二十六年(前 651)荀息死于晋国

骊姬乱中，苟息墓在今曲沃县城北苟王村。

是年，刻《太祖誓碑》。这块与宋代知识分子命运密切相关的石碑帖，堪称宋代最为神秘的一块石刻作品。由于石碑并没有流传下来，对于它在历史上存在的真实性，现代不少学者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以张荫麟、杜文玉和徐规为代表。但上述诸家并没有提供确切可信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不能让人十分信服。作者曾在《中国文化探秘》中谈及此碑：宋朝虽然政治军事上相对处于弱势，但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却获取了空前成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都成熟于这个时期。这是一件令人深思的现象，弱势的国防能力和强势的文化面貌之间，是怎样寻找到平衡点的呢？宋朝在科技文化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在很多领域，由于历史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到了宋代已是成熟发展的必然，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除此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政治因素，那就是宋朝对知识分子或士大夫采取了特别宽松的优抚政策，从而为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创造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这样说，宋代虽然偶尔也有一些文字狱的现象出现，但总的来说，宋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还是充满自由和理想色彩的。

宋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能享受这样的境遇，与一块从宋朝建立之初就已秘密镌刻的石碑密切相关，这就是著名的太祖誓碑。关于太祖誓碑的记载，最早见于两宋之交的曹勋，他在《松隐集》中一篇名为《进前十事札子》的文章中提及这样一件事：靖康之变（1126年），金人掳走徽钦宗父子，阁门宣赞舍人曹勋作为徽宗随从同行。北行途中，曹勋从燕山逃走，徽宗嘱托他转告康王赵构：“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曹勋后来又在《北狩见闻录》中再次记述了这段话，这段话后世史家称之为“徽宗寄语”。曹勋之后，宋人叶梦得（旧题陆游）在《避暑漫抄》中则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三

年派人神秘地镌刻了一块石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之中，称之为誓碑。誓碑平时从不开启示人，用销金黄幔密密遮蔽起来，并且门钥封闭十分严格。誓碑只在两个时候才能开启：一是太庙四季祭祀时，二是新天子即位登基时。在开启之时，也只有两个人能够看到誓碑的内容，一个是在位天子或新天子，一个是一名目不识丁的小黄门（太监）。其余的人都远立庭中，莫敢仰视。天子行至誓碑之前行再拜大礼，跪在地上瞻仰誓碑，并默诵于心，然后再拜而出。在此过程中，群臣及近侍既看不到誓碑内容，也听不到天子默诵的声音，因此没有人知道石碑上的誓词是什么内容。整个北宋的各代皇帝，都严格遵守着这个神秘的宣誓仪式，没有人敢违抗。一百多年过去了，太祖的誓碑仍然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之中，除皇帝之外，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事情到了靖康之变，这个赵宋王朝一等一的机密，才泄露人间：金人将宋朝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大门洞开，太庙寝殿夹室中的誓碑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誓碑高七八尺，宽有四尺多，碑上刻着三行誓词，共56个字：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这56个刻在石头上的字，有人认为是中国史上最为人不朽的名言之一。它是在古代封建皇权独裁制度下，统治者所能做到的最为开明、最为有效的制度设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并不是一石空文，或是做给世人看的摆设，它是从灵魂深处，刻进了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头脑中——它是箴言，也是法律，同时体现于行动之中，具有宪章的作用。它从最高端的制度设计上，从心灵上，对统治采取制约，尤其是第二条的践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为宋朝成为中华文明的巅峰打下了至为坚实的政治基础。英国《大宪章》在时间上比太祖誓碑晚了两百多年，在内容上则是国王与贵族间被迫签订的权力分配协议。太祖誓碑却不一样，它来自伟大君王的内在的良知和智慧。太祖誓碑可以称之为宋代大宪章，是

皇帝对臣下,尤其是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特别优遇和承诺,并有着宗教仪轨般的自我严格约束。

由于太祖誓碑的存在,宋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比之前或之后的,都要快乐和幸运得多。为此,深蒙这种恩泽的范仲淹,曾由衷地感叹道:自从我大宋建立以来,从来没有轻易滥杀过一个臣下,这是吾辈的幸事,也是国家的幸事,只有胸怀盛德的朝代,才能做出这样的明智之事啊!

前面提到,现代一些学者对太祖誓碑存在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宋代帝王并没有像誓碑所设定的那样,完全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比如宋钦宗杀大臣王黼、朱勔,宋高宗杀太学生陈东、欧阳澈,还有杀岳飞、韩侂胄等,这明显与太祖誓碑的盟誓相违背。二是太祖的保存方式值得怀疑——誓碑上的内容并不是见不得人的阴谋,如果正大光明地昭示出来,是一件很光彩的仁德之事,完全没有必要做得这样神神秘秘的。三是此碑不见于北宋时著作之中,至南北宋之交或南宋始知名于世。这几点质疑,其实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太祖誓碑上的第一条,整个宋代王朝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是遵守了的,对后周柴氏的后代,一直以友好和尊重的态度相待。清人袁栋指出:誓碑虽有三语,其实止一语也。末行是总束语,中行是陪衬语,只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于小儿,原有歉于隐微,故为是誓碑,而其忠厚处实过于六朝五代远矣,宜其享国久长哉。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朝历代统治者也是执行得很好的,因此才有范仲淹那样发自内心的感叹。在长达几百年的政治岁月中,有几个大臣或士大夫被杀,并不能以此就证明宋代君王没有守誓碑之约。第二个质疑更显苍白,太祖誓碑的内容如果一旦公示,其后果则可能导致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柴氏后代和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们可以肆无忌惮,可以视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因为他们知道,太祖已立下铁的规矩,他们命中已先天性获得了赦免权——赵匡胤是何等机智的人,他会做这样的傻事吗!至于第三点,因此碑不宜公示于世,如果没有靖康之变,也许南宋人也不会知道的。宋代士

大夫遭受迫害或杀戮的,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其间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与宋朝扬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有关,但毋庸讳言,也与宋太祖所立的那块石刻誓碑息息相关。即使这块誓碑后来消失了或者被战争损毁了,它仍然存在着,存在于宋代君王的心中,成为一种心灵的誓约。

[文献] 《左传》(鲁僖公二年、九年,鲁庄公二十八年),宋曹勋《松隐集》卷二六、《北狩见闻录》,宋叶梦得《避暑漫抄》,清袁栋《书隐丛说》卷六,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一一,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文史杂志》半月刊第1卷第7期),杜文玉《宋太祖誓碑质疑》(《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1期),徐规《宋太祖誓碑辨析》(《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向以鲜、王正可《中国文化探秘》(宋元篇)。

公元964年 乾德二年

[提示] 河南巩县建造永安陵及石刻。

[叙录] 是年,宋太祖改卜其父赵弘殷永安陵于河南府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建造永安陵及石刻。永安陵的营建,是北宋皇陵的开端。清人徐松在《宋会要辑稿》中载:永安陵在开封府开封县,今奉先资福禅院即其地。乾德二年,改卜于河南府巩县。陈朝云说,太祖赵匡胤即帝位后,为表忠孝,追封其父为宣祖,以帝陵之制将其父改卜于河南巩义市。自乾德二年,即北宋立国的第五年,直至北宋灭亡,此地共计埋葬有七个皇帝和被封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七帝八陵),附葬有22位皇后,以及上千座皇室子孙陪葬墓,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宋代陵墓群。永安陵现由上宫、孝惠贺皇后陵和淑德尹皇后陵组成,其下宫和陪葬墓地面上已不存形迹。永安陵上宫仅存陵台及神道石雕像四件,由南向北依次为控马官一件、石虎两件和石羊一件。郭湖生等在20世纪50年代末调查永安陵时,尚见到望柱一件、角端一件、马两件、虎一件、羊两件和客使两件。营

建永安陵时,大宋刚刚建立,南方尚未统一,宋代帝陵制度也还没有来得及确立。其石人、石虎、石羊等形象并不高大,颇类晚唐陵墓石刻,质朴,淳厚。所存文官石像较为出色,据刘兴珍载,石像高 240 厘米,刀法概括,风格质朴,具有五代至宋初过渡时期的石刻艺术特点。

[文献]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二),陈朝云《南北宋陵》,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 年第 11 期),刘兴珍等《中国古代雕塑图典》。

公元 965 年 乾德三年

[提示] 正月二十八日,王延光完成颍州开元寺地藏院新修罗汉功德堂雕塑。十二月二十八日,梦英篆书《千字文碑》。是年,开凿泉州九日山摩崖大佛。

[叙录] 正月二十八日,王延光完成颍州开元寺地藏院新修罗汉功德堂雕塑。王延光为北宋汴梁(开封)人,宋人张邴撰有《颍州开元寺地藏院新修罗汉功德堂记》(见《全宋文》),记中说:殿堂既备,圣相是陈,爰命良工,式模梵质。请京师王延光、妆塑赵守忠等,妆塑释迦一躯,螺髻连趺,举高五丈。文殊、普贤、饮光(迦叶)、庆喜(阿难)、供养菩萨、掖卫善神(天王)并前护法大阿罗汉,及法住记王庆友尊者并仆从等,统数三十六事,并功绝世美,妙尽物华。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厥功告毕,庆赞云终。爰自备物,迄以立功,辰浹二百旬,金费五百刀。记中称赞王延光的塑像技艺,可与唐代大雕塑家安生、吴道子比肩,足见艺术造诣已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梦英篆书《千字文碑》。此碑全称《篆书千字及楷书释字碑》,现存西安碑林中。碑高 327 厘米、宽 103 厘米,螭首龟趺,由梦英和尚篆书。篆字之下均有楷书释字,由袁正己书丹。曾毅公考,此碑刻工为安仁裕(武威郡人)。碑阴之上,则刻有乾德五年(967)皇甫俨镌刻的陶谷所写序

文。梦英为北宋名僧,衡州(湖南)人。师号宣义。其篆书曾与郭忠恕齐名,宋人朱长文于《墨池编》中记载了梦英的生平,并说,梦英“效十八体书,尤工玉箸”。除此碑之外,梦英还书有《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篆书十八体诗刻》、《扶风夫子庙堂记》、《张仲苟抄高僧传序碑》等碑。

乾德三年,开凿泉州九日山摩崖大佛。吴文良载,福建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在泉州市西郊外,旧属南安县丰州镇,在晋江下游北岸,距泉州市约六公里。九日山分东、西、北三峰(三台),东西峰崖上现存乾德三年至清乾隆年间摩崖石刻 70 多方,著名者有如宋代蔡襄、虞仲房等。其中,尤以北宋崇宁三年(1104)至南宋咸淳二年(1266)的 13 方祈风石刻广为人知。九日山大佛刻于西峰(高士峰)绝顶,石佛为阿弥陀佛,乾德三年由陈洪进倡刻。像高 450 厘米、宽 150 厘米,袒胸盘坐莲座之上,刀法流畅,衣纹对称而简括,是为泉州最早的大型石雕造像,外筑石亭,则为清代建筑。

[文献] 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三,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二册,曾毅公《石刻考工录》,吴文良《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物》1962 年第 11 期)。

公元 966 年 乾德四年

[提示] 四月十三日,陕西《黄帝阴符经》碑。是年,朝廷遣僧人往印度取经。

[叙录] 四月十三日,陕西刻《黄帝阴符经》碑。刻碑体例仿三国魏《正始石经》,以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对照刻制,故又称《三体阴符经》。颇为特殊之处在于,此石经并没有独立刻碑,而是雕刻于《隆禅法师碑》的碑侧面,现存西安碑林。其碑高 185 厘米、宽 87 厘米,经文竖刻,字体小篆为主,古文、隶书分别对应刻于篆体之下。此经书丹者,则是宋初大书画家郭忠恕。《阴符经》为道教经典,主要讲“阴阳相胜之术”,并认为治国安邦,其要在清净自化;用兵打仗,其要在奇正权谋。《新唐书》(艺文志)归此

经入道家类,凡一卷。据丁贻谋、韩钢等人研究,此经作者及成书年代,论说甚多,书当出于唐前。作者并非前人所称黄帝、寇谦之或李笙。其经文有300余字及400余字两种,因其主要文句一致,故两者并传。《黄帝阴符经》于唐代始广为流传,其注疏也同时出现,至宋出现研究高峰,现存唐宋《阴符经》注疏达19种之多。在此期间,学者从道学、丹术、兵法等方面依托经文发表自己的观点,学术界也渐渐形成《阴符经》研究的风气,即便是程颐、朱熹这样的学者也偶有涉足。曾毅公考证认为,此碑刻工安祚,疑即安仁祚,或省去行辈字“仁”。如辽石工吴世永、吴世深、吴世景等,省去行辈“世”字,作吴永、吴深、吴景;安文璨、安文晟省去“文”字,作安璨、安晟。程章灿则认为,造成此种省字的原因,在于刻工世袭与家族化所致。题署中简省名字及用同音字代替等做法,在版刻刻工中也有类似表现,形成一个有益的参照系统。

是年,朝廷数遣僧人往印度求经。宋人释志磐载,乾德四年,诏准行勤等157人,西往求舍利及经。这些文化使臣在印度游学、求法时间前后长达12年之久,于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始返回。这次外事活动,为宋代历史上首次由政府派人出国留学求经。于此,亦可看出宋朝对外所持较为开放的态度。

[文献] 宋宋祁等《新唐书》卷五七,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三,丁贻谋等《阴符经》(《宗教学研究》1983年第2期),韩钢《唐宋〈阴符经〉注疏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曾毅公《石刻考工录》,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

公元967年 乾德五年

[提示] 《梦英十八体诗刻》。白鹿原建炎帝庙奉祀。

[叙录] 是年之《梦英十八体诗刻》,清人陆耀遒有著录:石高四尺一寸、广二尺五寸,行字不计,在陕西西安府学碑林,即现在的西安碑林中。《十八体

诗刻》由释梦英以古文、大篆、籀文、回鸾篆、柳叶篆、垂云篆、雕虫篆、小篆、填篆、飞白、英芝篆、剪刀篆、薤叶篆、龙爪篆、蝌蚪篆、璎珞篆、悬针篆、垂露篆等18种篆书字体对照书成。碑文所书系录自《昭明文选》的惠休一首五言古诗。碑文共分四截,每截行字及字之大小不一,正文连落款计180字,每五字为一体。每一字体又以隶书记其名及其缘起。梦英此碑的目的,是希望借此帮助人们认识各种篆书字体,同时也展现出书者深厚的功力。释梦英是五代末、北宋初年著名的书法家,周旋于官宦文人之间,影响甚大。但有人认为这儿各种篆体多为宋代梦英杜撰,非古所有,宋人黄庭坚、米芾即持此观点。曾毅公考,此碑刻工为安文璨(前摄镇国军节度巡官),与刻《黄帝阴符经》碑的安仁祚当为同族人。

是年,于白鹿原建炎帝庙奉祀。炎帝葬地,宋李昉等在《太平御览》中,引晋人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载,炎帝“崩葬长沙”。宋太祖登基后,遍访古代陵,在茶陵康乐乡白鹿原寻到炎帝陵,并于乾德五年在白鹿原(原酃县、今炎陵县城西南塘田乡鹿原陂)建庙奉祀。炎帝陵自宋建庙后,三岁一举,率以为常。据《宋史》(礼志)载,太祖命李昉、卢多逊、王祐、扈蒙等分撰岳、渎祠及历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诏孙崇望等分诣诸庙书于石。六年,遣使奉衣、冠、剑、履,送西镇吴岳庙。清道光《炎陵志》(见《九嶷山志二种》)上载:炎帝陵自乾德五年太祖访得,建庙陵上,遣比部(属刑部)员外郎丁颐言诣潭州祭告,是已有庙,有庙应亦有碑。可惜所立碑石现已无考。

[文献]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八,元脱脱《宋史》卷一〇二,清陆耀遒《金石续编》卷一三,曾毅公《石刻考工录》,吴绳祖等编《九嶷山志二种》。

公元968年 乾德六年

[提示] 十月十五日,陕西刻《摩利支天经碑》。

[叙录] 十月十五日,陕西刻《摩利支天经碑》。此碑清人王昶著录:碑高五尺五寸、广二尺六寸三

分,作五截,上二截皆二十行,下皆二十六行,行十一字或十字不等,正书,在西安府学(存西安碑林)。汝南袁正己书,安仁祚刻字。碑阴上刻图,则由李奉珪、翟守素绘制。《佛说摩利支天经》,为唐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奉诏译出。据刘荔等讲,摩利支女神本为佛教护法菩萨,梵文“摩利支”意即光明,所以在藏传佛教中又称之“光明天母”,具有广大自在的神通。摩利支天的造像为天女,执莲花,顶宝塔,坐骑为金猪,其周围有群猪环绕。比较有趣的是,这个佛教人物后来也走进了道教神仙系统,被尊称为“斗母元君”,其长子及次子分别为道教“四御”中的“勾陈大帝”和“紫微大帝”,其余七子则为“北斗七星君”。

[文献]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二四,王荔《摩利支天为何方神氏》(张涌泉等《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公元 969 年 开宝二年

[提示] 陕西富县石泓寺石窟第五窟宋代题记。

[叙录] 李淞载,陕西富县石泓寺石窟第五窟有中央佛坛,造像为一佛二弟二菩萨,北壁上部有九罗汉,刻宋初题记,有“惟大宋开宝二年”等字样。

[文献] 李淞《陕西古代佛教美术》。

公元 971 年 开宝四年 大理明政三年

[提示] 云南《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宋太祖敕命铸造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本尊及石刻基座。

[叙录] 开宝四年即大理段素顺明政三年,云南刻立《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据赵超、周祐等载,云南白族段氏建立的大理国在西南延续了 300 多年,至今仍在云南曲靖县、姚安县、剑川县、大理市等地留有重要的文物遗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大理国段氏与 37 部会盟碑》。此碑又名《石城会盟碑》,后来被湮没,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才重新发现于云南曲靖城北旧石城遗址。旧在北城外武侯祠,后移置奎阁壁间,20 世纪 30 年代又移置现在曲靖县第一中学爨碑亭内。石碑高 125 厘米、宽 58 厘米、厚 16 厘米。碑文分上下两段镌刻:上为楷书正文;下为会盟各部首领署名,行书。清人王昶著录此碑,碑文记述大理国主三军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珍,奉宋太祖诏命,与彝族 37 部联军击败滇东众镇叛兵后,召集“东爨乌蛮”各部首领,于石城(曲靖)颁职赐赏,会盟发誓,永保合作的历史。此次会盟正史中没有记载,碑文可补史籍之缺失。

同年,宋太祖敕命铸造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本尊。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的本尊铜铸金装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立像,为北宋开宝四年宋太祖敕命铸造,铜像高达 22.5 米。铜像基座为青石雕造而成,其负重力士刀法圆熟、夸张而生动,是宋代早期石刻艺术精品(图 197)。李玉珉载,全像分七段浇铸而成,为我国唐宋金铜造像中最高大一躯。观音造像姿势挺直,璎珞天衣以及衣褶等多作对称式安排,使整体形象端庄严肃。可惜其 40 臂为后来补装,雕工十分拙劣,破坏了原作神韵。据刘兴珍等记载,此像为郑延勋负责雕铸,因获得宋太祖赵匡胤允准,官府从各军征调士卒 3 000 人,与匠人共同完成。此像铸造工程浩大,表现出郑延勋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设计天赋。

[文献] 清《金石萃编》卷一六〇,赵超《石刻史话》,周祐《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考说》(《大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 年第 3 期),李玉珉《中国佛教美术史》,刘兴珍等《中国古代雕塑图典》,张秀生等《中国古代建筑——正定隆兴寺》。

公元 972 年 开宝五年

[提示] 闰二月二十八日,河南《嵩山会善寺重修佛殿记》。

[叙录] 闰二月二十八日,河南刻《嵩山会善寺



图 197 力士 开宝四年(971) 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

重修佛殿记》。嵩山会善寺,位于河南登封嵩山太室西南麓积翠峰下,与少室山少林寺、嵩岳寺齐名。据此碑所载,会善寺本为北魏孝文帝夏季行宫,后捐为佛寺,隋开皇间改名为会善寺。据开元十五年(727)《大唐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见《金石萃编》)记载,道安曾与慧能、神秀等同在五祖弘忍门下修习,后居会善寺。曾毅公考,此碑刻工为莫仁美。

〔文献〕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七七,曾毅公《石刻考工录》。

公元 973 年 开宝六年

〔提示〕六月,陕西《新修唐高祖庙碑铭》。

〔叙录〕六月,陕西刻《新修唐高祖庙碑铭》。此碑清人王昶曾著录:碑高一丈二尺六寸、广四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九字至六十四字不等,行书。额篆题“大宋新修唐高祖皇帝庙之碑”12字。由中大夫行尚书勋员外郎和峴奉撰文、翰林院侍诏朝议大夫太子洗马同正臣张仁愿奉敕书丹。《新修唐高祖

庙碑铭》位于蒲城县金粟山唐玄宗泰陵 2.5 公里处，此地原为天子祭祖圣所下宫遗址。碑文记述宋太祖下诏重修历代被盗帝陵及修复泰陵之事，并载有“圣朝乾德四年(966)敕置守陵人户，建庙于旧陵之侧。内降礼衣一幅，常服一袭，以衣之”等事。高祖庙碑即唐献陵，据陈安利说，此碑后毁，但碑文尚存，内容多系为李渊歌功颂德之词，同时将新修之殿宇形容为可与汉之未央、建章二宫媲美。

[文献]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二四，陈安利《唐十八陵》。

公元 974 年 开宝七年

[提示] 四川安岳卧佛院修妆释迦牟尼佛部众一龕。

[叙录] 据刘长久、彭定胜载，是年，冯崇夫妇为刘氏在四川安岳卧佛院修妆释迦牟尼佛部众一龕。地处四川省中部的安岳县(古称普州)。境内山石奇秀，《舆地记胜》载：普之秀以石，故俗称石秀。自南朝梁普通二年(521)当地就开始凿造佛像，历代均有摩崖造像传世，是川中地区佛教造像时代较早、内容丰富、数量集中的石刻之乡。卧佛院所在的山沟俗称卧佛沟，其造像是安岳摩崖造像群中规模较大的一处，位于县北通贤区八庙乡卧佛村，地临安岳、遂宁与乐至三县的交界处。

[文献]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五八，刘长久《安岳石窟艺术》，彭家胜《四川安岳卧佛院调查》(《文物》1988年第8期)。

公元 975 年 宋开宝八年 辽应历七年

[提示] 宋开宝八年，陕西富县石泓寺石窟造像记。辽应历七年正月，《王进卿造释迦坐像》。

[叙录] 宋开宝八年，陕西富县石泓寺石窟造像记。李淞载，富县石泓寺石窟第一窟为隋代开凿，

经唐、宋续造像的洞窟。有宋造像一则：大宋开宝八年，匠人米廷福。

金申著录一件辽代应历七年正月的《王进卿造释迦坐像》，为砂岩石质，像高 40 厘米。1956 年 10 月发现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大明，现藏内蒙古博物馆，发愿文为：应历七年正月□日，铁山功德主王进卿、女弟子张氏、男大神、二神造。

[文献] 李淞《陕西古代佛教美术》，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公元 976 年 开宝九年

[提示] 十月二十日，始建宋太祖永昌陵及石刻。十一月，杭州建雷峰塔。

[叙录] 十月二十日，始建宋太祖永昌陵及石刻。从文献记载来看，宋太祖是生前自己选定陵址的。宋代僧人释文莹记载说：开宝九年，宋太祖西幸洛阳，归途中谒永安陵之后，太祖即更衣，取弧矢，登阙台，望西北鸣弦发矢，以矢委处，谓左右道：即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马埋于下，又说：朕自为陵名永昌。宋人李焘于太祖开宝九年三月庚辰条中，也有类似记载。宋太祖死后即葬于此地(河南巩县北端老龙洼)，称永昌陵。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宋太祖崩，始建永昌陵。据陈朝云说，太平兴国二年(977)四月十三日入葬，建陵时间只有短短的五个月又二十二天。赵宋王朝至开宝八年(975)灭掉南唐之后，终于结束了割据政权时代。次年宋太祖辞世，作为开国君主的永昌陵，其气度当有别于晚唐五代末世之风。刘兴珍说，陵寝神道石刻内容的设置，自永昌陵后形成定制。一般自南向北为望柱一对、象一对、象奴一对、仗马一或两对、控马官四对及虎和镇陵将军等。永昌陵的石刻已展示宋刻的写实功夫，如驯象人的头发短而卷曲，有异域色彩，颇类非洲人。同时在继承唐陵朱雀(鸵鸟)浮雕基础上，创造出瑞禽石屏，马面龙身、鹰爪凤尾，背景为重峦叠嶂，下角有幼兽出没，并瑞禽形成呼应(图 198)。另一种被称为角端的瑞兽则为永昌陵首创，这种神兽在

传统瑞兽基础上发生变化:麒麟头、独角,长卷上唇,狮身带翼、四爪(图199)。《宋书》(符瑞志)载:角端者,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明君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之事,则捧书而至。此外,永昌的石羊颈部修长,表情谦恭,体态俊朗。而仗马与控马官石刻,刀法精练,比例适当,表现了宋人高超的写实技艺。永昌陵的武臣石刻,浓密短髯,虎背熊腰,双手拄剑而立,显得气宇轩昂。陈朝云还特别提到神道两侧的镇陵将军,其面部刻画右颊比左颊略为窄瘦,正面看去似乎不大协调,但因透视关系,祭陵者由南向北一路走来,所见到的将军脸面,眉目生威,侧视行人,全无不妥。这种观察入微的石刻表达,是在之前的石刻中从未出现过的新景象。

是年十一月,钱俶妻孙氏卒,杭州建雷峰塔。宋人潜说友录有此塔造塔记,记文中说此塔“曰黄妃云”。据郑嘉励报道,20世纪初因雷峰塔倒塌,曾对雷峰塔地宫进行过发掘,并出土跋文残碑,上有“塔因名之曰皇妃”等语。金申认为,此处的皇妃当指钱俶妻贤德顺穆夫人孙氏,曾于开宝九年正月随钱俶赴汴京朝见宋太祖,三月被宋廷封为吴越王妃,孙氏于当年十一月去世。黄妃即皇妃,但皇妃名号过显,有僭越之嫌,故《咸淳临安志》改用黄妃。又据陈杏珍载,雷峰塔倒塌后,于砖孔中发现木版舍利图上印有“丙子□月□日弟子王承益造”题记。此丙子即开宝九年,可知雷峰塔在此后不久即建成。从《咸淳临安志》中所记载的“宫监等合力”建造来看,可推知此塔应是以钱妻孙氏为首倡,宫人内监随喜而建成。

[文献] 南朝沈约《宋书》卷二七,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七,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八二,陈朝云《南北宋陵》,刘兴珍等《中国古代雕塑图典》,金申《佛教美术丛考》,郑嘉励《走进雷峰塔地宫》(《中国文物报》2001年7月8日),陈杏珍《雷峰塔的名称及其他》(《文物天地》1997年第6期)。

公元977年 太平兴国二年

[提示] 河北定州净众院舍利塔。

[叙录] 开宝九年(976)冬十月,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太祖胞弟赵匡义(后更为光义)奉金匮之盟即位。按通常的规矩,应于继位次年改元,但太宗赵光义在他哥哥辞世的次日即将开宝九年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这种仓促的政治行为,或者与释文莹、司马光所说的“斧声烛影”中赵光义谋兄夺位的传说相关。

是年,建成河北定州净众院舍利塔。金申说,涅槃造像中,在犍陀罗、克孜尔、莫高窟等地,老迦叶历来是位于释迦足部的,接足礼拜。据《涅槃经》载,释迦临终时大迦叶正在外地,从外道处闻讯急忙赶回来,犍陀罗石雕上有表现他与裸形外道谈话的场面。又因迦叶迟来之故,释迦特意从棺中现出双足,迦叶抚足礼拜。此情节在犍陀罗和麦积山第133号窟北魏造像碑以及莫高窟初唐以后的涅槃图上都可看到,即所谓大迦叶抚足。迦叶抚足的画面尽管到明代依然可见,但在宋辽时,抚足者不是迦叶而是变成了束发戴冠、蓄须、着俗装的贵人像,较早的例子可见河北定州净众院舍利塔地宫壁画涅槃图上(此地宫内有墨书太平兴国二年题记)。从定县博物馆相关记载可知,释迦足旁即是如此装束(戴冠蓄须俗装)的老者,正以右手抚足。老年形弟子(应即迦叶)反而位于老者身后。壁画上没有出现持金刚神和密迹力士,画面左右最外侧各有一丑陋的外道在庆幸释迦涅槃而起舞。

[文献]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七,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金申《佛教美术丛考》,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

公元978年 太平兴国三年

[提示] 建成崇文院。

[叙录] 是年,建成崇文院。据宋人吴处厚及曾巩等记载,宋初,皇家馆藏图书仅有12000余卷,等平定南唐后蜀等地后,仅从后蜀即得书13000卷,



图 198 永昌陵朱雀 开宝九年(976) 河南巩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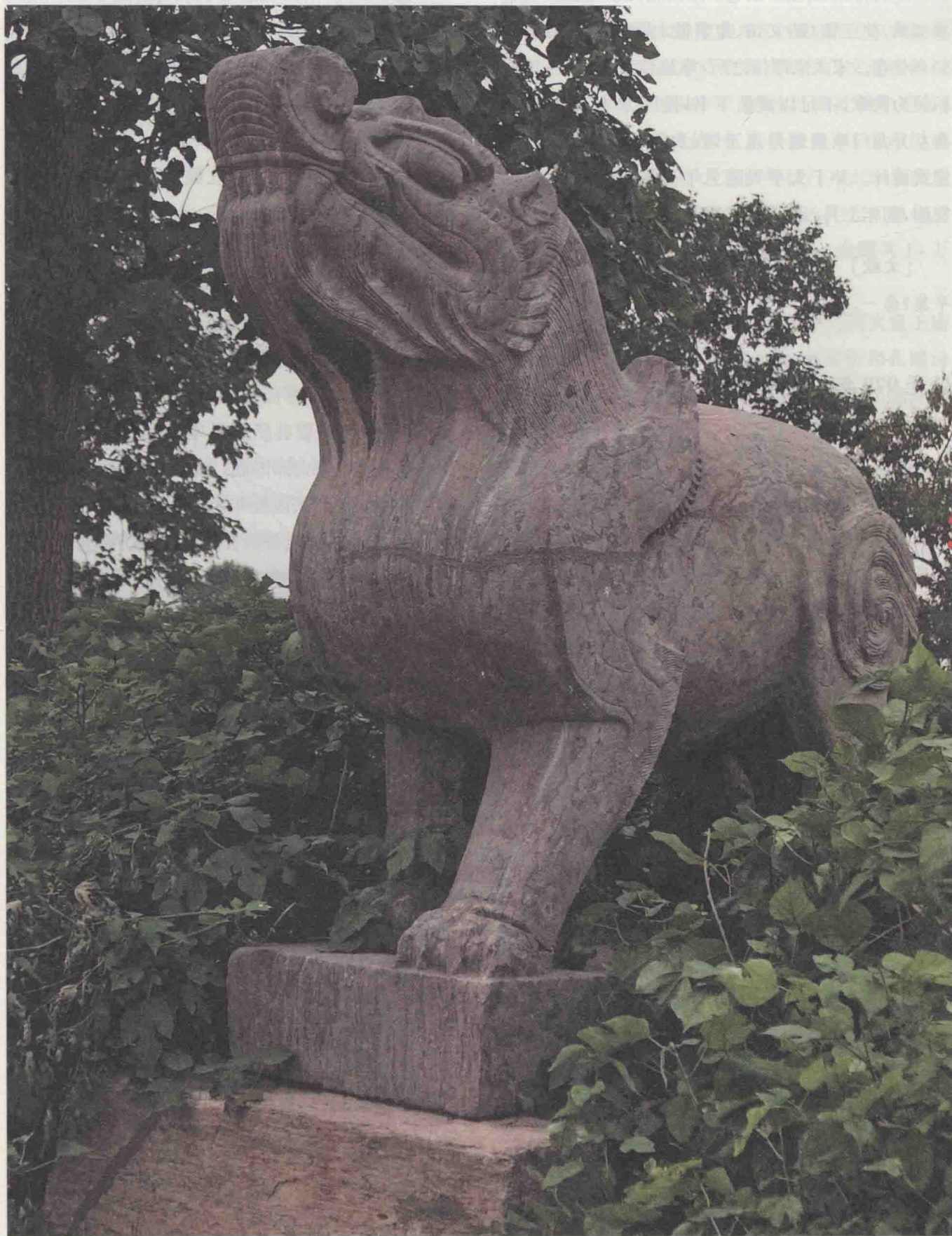


图 199 永昌陵角端 开宝九年(976) 河南巩县